



新 十日談

金觀濤

劉青峰

關於文化重建與中國前途的對話

新十日談

金觀濤
劉青峯

關於文化重建與中國前途的對話

新十日談・金觀濤 劉青峯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大道東109~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5-283671 圖文傳真：5-865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5-283605 5-8650708 圖文傳真：5-8611541

承印：藝城印刷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40號富城工業大廈16樓A4

電話：5-8971089 圖文傳真：5-582439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3-3031010(13線) 圖文傳真：3-7641310

© COMOS BOOKS LTD. 1990.

ISBN 962 257 445 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〇年・香港

作者簡介

金觀濤，男，一九四七年生，浙江義烏人。一九七〇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學系，曾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訪問研究。現為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科學哲學研究室主任，並兼《科學、經濟、社會研究發展中心》副主任、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主編「走向未來」雜誌及叢書，為大陸四大思想家之一。

劉青峯，女，山西岢嵐人。一九六九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現為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兼任《科學、經濟、社會研究發展中心》高級研究員，與金觀濤為夫妻，亦為學術研究搭檔。

他們的代表作有：《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金觀濤與劉青峯集——探索與新知》、《金觀濤與劉青峯集——創造與反思》、《新十日談》等。



金觀濤和劉青峯夫婦一九八九年春于北京。

前言

謹以此書獻給偉大的五四運動七十周年。

謹以此書獻給中國民主化的推動者：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

「五四」是中國社會由傳統邁向現代的轉折點。

這是一個占人類人口四分之一、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社會的現代化，其氣勢之浩瀚，道路之曲折，追求之動人，都將永遠記錄在人類爭取自身解放的史冊上。只要中國社會現代化沒有完成，「五四」提出的科學與民主、創造新文化就仍然是時代的主題。

序：獻給那些不願意放棄希望的人們

「……本書的開端雖然淒涼，却好比一座險峻的高山，擋住一片美麗的平原，翻過前面的高山，就來到那賞心悅目的境界；攀援的艱苦就換來了加倍的歡樂。樂極固然生悲；悲苦到了盡頭，也會湧起了意想不到的歡樂。」

這是文藝復興時代名作家卜伽丘在他的巨著《十日談》第一天中寫下的話。本書取名為《新十日談》，自然很可能使讀者產生一種印象，作者即使還沒有狂妄到想把這本小書和《十日談》攀比，至少也是想做某種暗示：今天中國所處的時代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有點兒相似。

其實，這也是一種誤解。卜伽丘寫《十日談》時，正是十四世紀西方社會處於極為黑暗、幾乎看不到希望的年代。當時，無論是卜伽丘、還是其他敏感的思想家，甚至可以說連同人們所相信的先知，都無從感受到那時正處於人類歷史上一種偉大的新文明興起的前夜。只要查一下

有關中世紀的史書，就可以看到：十四世紀的西方是一個衰敗的世紀。以往的進步都走到了盡頭：道德淪喪，黑死病流行，作為世俗精神生活凝聚力的教會因其自身的腐敗墮落，已失去了對人民的感召力。人們雖然還不得不生活在已經習慣了的社會中，却又被世紀末的情緒籠罩着。當事人無法判斷，這是漫漫長夜的開始，還是黎明前的黑暗？至今，儘管學術界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興起提出了種種解釋，但仍然並不能確切地說明資本主義為何在西歐產生。至於在卜伽丘的時代，距資本主義文明興起，還足足有兩個世紀以上之遙，更不可能預言未來歷史的發展。

但是，人具有一種十分幸運的天性。就這是很願意對歷史進行事後的樂觀宿命的解釋，並且總是記住漫長困苦生涯中的短暫歡樂，而忘却掙扎和苦難。當代把《十日談》作為文藝復興的標誌，雖然是事後的總結，却又是意味深長的。《十日談》中充溢着對人性解放的讚美和呼喚，這是神學統治的中世紀裏的異質文化。確實，如果沒有生機勃勃的西方近代文明的興起，人們也就不會從那個黑暗的中世紀裏去尋找偉大文明的開始。正如沒有在中原大地上翻滾咆哮的黃河，人們也不會有興趣到冰雪高原上去尋找星宿海那點點源流。

今天，中國社會和文化面臨着空前嚴峻的挑戰和危機。論述中國人口危機、生態危機、糧食危機、財政危機的文章著作紛紛出籠。尤其是一九八八年《世界經濟導報》關於中國是否將被

開除「球籍」的討論，及《河殤》在中國、乃至世界華人社會中引起的震盪，都使得中國的危機意識在精神層面上得到展示。同時，龍年伊始，上海的甲肝大流行，幾次重大空難與火車撞車惡性事故，各地搶購風潮、提款恐慌，弄得人心惶惶。也許，一九八八年是人心變化最快最大的一年。就連最理解改革、在改革中得到經濟實惠最少的知識分子，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被說成「知識分子很危險」，似乎他們也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不少青年學生已失去了政治熱情，紛紛出國，稱之為「勝利大逃亡」。一種冰海沉船、世紀末的心態在彌漫着，文化失範的種種現象在擴散着……

本來，我們的寫作計畫中沒有安排寫這本小書。是去年十月，《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和四川社科院在成都召開的「中國學者展望二十一世紀」學術討論會期間，一位出版界的朋友馬嵩山先生誠懇地希望我們在這一十分艱難迷惘的歲月抽出時間和讀者談談中國的前途，他建議我們對即將到來的「五四」七十周年紀念寫一本對話集。他那真誠的責任心和語重心長的談話，深深感召了我們，使我們暫時走出純學術的象牙塔，承諾了這一相當艱難的寫作。另一方面，雖然我們多年來主要從事歷史、哲學等文化理論的探索，但從來沒有遠離中國的現實，也沒有完全關在書齋之中。今天中國的學者如果說他不痛苦、不困惑，可以安然地沉醉在自己純學術的興趣中，那麼他就可能不是不夠誠實，就是在逃避。

這樣，我們開始寫《新十日談》。一方面談話、討論的形式比較輕鬆，也是我們還來不及做充分的學術性研究而不得不採取的一種形式；另一方面，也是我們在當前普遍的世紀末情緒中，和廣大讀者溝通談心的一種願望。我們認為，在種種危機中，最爲嚴峻的是我們的文化及精神狀態。這不等於說腐敗、通貨膨脹、或其他成堆的現實問題不重要。關鍵在於，我們當中有些人已經失去了歷史上曾有過的忍耐、韌性，失去了在困境中的勇敢。大眾也似乎變得格外不耐煩，很少運用自己的理智。有不少人不相信自己對社會或旁人負有什麼責任。人們的內心深處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空虛和軟弱。薩特喜歡引夏多布里昂的說法，把自己比作一架寫作機器，並說：「我寫作，故我存在。」其實，只有那些生活在動盪不安、變化急劇時代中，又深深感到社會責任壓力的人，才能體會到這句戲言的沉重及作者內心的苦澀。

同樣，今天我們面臨社會急速變化，文化全面失範，人們不知道正在往何處去之時，社會內部的騷動不安總是把思想家從沉思默想中驚醒，和人民一道面對現實的問題，一起去思考，並做出自己的回答。

《十日談》開篇中，卜伽丘極力渲染了中世紀歐洲那場可怕的瘟疫，更可怖的是人們「不知道這場瘟疫是受了天體的影響，還是威嚴的天主降於作惡多端的人類的懲罰」，「眼看着這場瘟疫不斷地一處處蔓延開來」。從來，對於人類來說，某種災難之所以可怕，就在於原因不

明。人們會像幼兒恐懼黑暗一樣，在自己尚未認清的威脅面前驚慌失措。今天，對中國社會和文化面臨的危機，人們已經有相當廣泛的共識。人們已不再滿足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理論上的盲目性。改革已經走到今天這一步了，向後退是死路，向前走又沒有足夠的勇氣和信心。十多年了，理論上的貧弱，精神上的自欺，人們強打精神而不敢正視自己。似乎當今中國只有那些自稱能呼風喚雨、滅火救災的蜂擁而出的「氣功師」們，和那些會意念移動、神通天地的「特異功能」大師，才表現出不可一世的自信。可惜，人們並不相信這些「大師」們有救世的回天之術。然而，我們拒絕相信存在着一種精神上的不治之症。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有勇氣運用理性。

《十日談》把在危機面前人們所採取的態度分成四類：

「有些人以為只要清心寡慾，過着有節制的生活，就能逃過這一場瘟疫。於是他們……完全和外界隔絕起來，……對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們完全不聞不問，……」

「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認為唯有縱情歡樂，豪飲狂歌，儘量滿足自己的一切慾望，什麼都一笑置之，才是對付瘟疫的有效辦法。……」

「有些人爲了自身的安全，竟抱着一種更殘忍的見解。他們說，要對抗瘟疫，只有一個辦法——唯一的好辦法，那就是躲開瘟疫。有了這些想法的男男女女，就只關心他們自己，其餘

的一概不管。他們背離自己的城市，丟下自己的老家、自己的親人和財產，投奔到別的地方去，……他們以為留住任在城裏的人們末日已到，不久就要全數滅亡了。」

還有一類就是書中講故事的男男女女，他們說：

「我們不願意把自己的生命當作兒戲，坐以待斃……，不過……那班人的那種墮落的生活，我們也要避免；……我們可以由着自己的心意尋求快樂；但並不越出理性的規範。」

這些講故事的男女們在危難恐慌之中，表現出一種大無畏的從容風度。在黑死病瘟神的死亡陰影下，在人們普遍絕望而放縱墮落的時候，他們內心却充滿着啓蒙精神，渴望新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這是由於，他們依然相信，「儘管上天對我們這樣嚴酷，可還是在我們眼前展露了它那永恆的美麗」，災難總會過去，「只要死神不來召喚我們，總有一天可以看到天主來收拾眼前的瘟疫。」他們講了一些美麗的故事，成為新時代的先驅。

我們缺乏卜伽丘那種瀟灑的文學才華，也沒有書中講故事的男女們對天主和命運那種虔誠純潔的信仰；但是，我們却有着在困境中不逃避、不放縱自己的嚴肅的理智，有着對民族振興事業不可動搖的信念。正因為這一點，我們的心靈，被文藝復興時代的先驅和大師們的創造精神和勇氣所感動、所激勵，同時又在這種精神的感召下，面對中國當今的現實問題，做出自己

的回答。我們不能也不該迴避一系列相當尖銳而敏感的問題。

《新十日談》採取亦文亦議的形式。文章多是一九八八、八九年寫的，理論色彩較濃厚，由於正文中很多問題沒能展開論述，於是放在附錄中。而正文由十天的討論展開，使讀者能比較輕鬆地與我們一起思考。在「第一天」裏，我們提出了「五四」的時代還沒有結束嗎？」這樣一個疑問，指出中國近代史上從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文化層面的改革，這一「五四」前後的歷史發展過程，幾乎正在被當今中國的社會變革重複着，只是時間大大壓縮了，這不是偶然現象。但是，「五四」以後白話文所促進的大眾傳播媒介，對社會生活的越來越廣泛深入的參與，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從而建立了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這兩件重大的基礎性的變革，却是中國傳統社會從來沒有的新事物。因此，我們今天能否超越「五四」，就必須從這個發生了根本變化的新出發點上，對近現代史進行再思考。

在接下來的三天裏，我們從歷史發展的長程動力的角度，考察了社會主義為什麼能在中國大陸占主導地位，以及這種現實中隱含着的、今天我們所面臨的種種困境的歷史因素。這是一個不能迴避的話題，也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現實生活和潛在的心理情結。我們指出，社會主義大規模的實踐是二十世紀人類特有的歷史現象，它是三種長程歷史動力綜合作用的結果。第一種動力，是現代化後進的國家尋求民族獨立、和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現代化目標的民族

主義；第二種動力，來自於十九世紀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使人們企圖自覺地利用被視為「科學」的理論來改造社會的實踐，這也是科學作為一種文化力量，第一次干預社會模式的設計，所實施的巨大社會工程。但是由於人們對科學的期待超過了對社會的科學認識，所以往往很難達到預期的目標。第三種力量，是傳統（包括文化及基本構架）在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潛在的作用及復甦。正是這三種力量結合，產生了驚心動魄的「意識形態社會工程」。

今天，是我們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的時候了，我們必須把建國之初新民主主義為何被放棄，為什麼會出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放到我們文化反思的視野之中。

第五第六兩天中，我們討論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出現的文化基礎，並考察這兩次全國規模的喪失理性的現象，是怎樣發生的。這些討論，有助於進一步認識中國兩千餘年來的大傳統與近幾十年的新傳統之間的關係。我們認為，正是這七十年發人深省的歷史和全民族付出的代價，迫使新一代人對什麼是理想社會，進行反思。我們應該從歷史和哲學中汲取智慧。一個理想的社會，並不是一個沒有弊病的十全十美的社會，而是可以自動地糾正錯誤、不斷擴大對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容量的社會。我們將其稱為「開放的科學理性社會」。從歷史演變的內在邏輯來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趨於這種「開放的科學理性社會」的過渡階段。

接着，我們從現代化和後工業社會的角度，討論了一般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差異。然

後，提出了中國文化道德倫理中心主義的結構性缺陷，及文化重建的有關設想。

以上內容都是重大而嚴肅的，相信也是人們普遍感興趣的。但是，我們深知自己的學識也許還不足以真正切中問題的實質。我們之所以還是把自己有關的思考公諸於衆，是爲現實所迫。本文開頭，我們列數了當前的種種危機和世紀末情緒的擴展。但我們依然堅信，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中華民族毀滅，中華民族是條永不會沉沒的航船。在這充滿困惑的時刻，人們特別需要溝通，需要以誠相見。其實，我們真正的困難，在於我們如何戰勝自己。中華民族應該、而且能夠重建新文化，促進中華民族深沉的智慧得以創造性的發揚，促進在中國形成一個開放的科學、民主、理性的社會結構，爲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做出貢獻。

我們的思考，只是千萬當代中國人思想視野裏的一種角度。我們有勇氣在尚不完全成熟的情況下與其他人進行溝通，是出於這樣兩個信念：第一，知識份子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和民主化的主導力量，是新文化創造思潮的中流砥柱。現在，一種偉大的力量正在中國大地興起，這就是獨立知識份子的出現。我們希望，我們的思考會激起更多人更深沉的思考。如果千百萬人都能嚴肅而勇敢地思考，並在互相溝通中認同，那就會湧起巨大的精神解放的潮流，這就意味着中國文化重建的真正開始。第二，在「五四」七十周年紀念日到來之前，我們不應該愧對這七十年的歷史，我們應該在「五四」高揚的科學與民主的大旗下，對科學與民主作出更具有

歷史反思性的理解。

一九八九年三月於北京中關村

作者



世紀末的情緒在大地上蔓延，那時沒有人能判斷這是新時代黎明前的黑暗，還是漫漫長夜的開始。